

基歇尔《中华图说》中的 中国动物书写与中国想象

肖丽华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是早期西方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中华图说》作为其全球知识编撰工程的关键成果,其中大量关于中国动物的书写,深度参与了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想象与知识建构,但相关研究仍相对不足。在梳理基歇尔知识观的基础上,以凤凰与猿猴为代表性个案,可以有效考察他如何通过图像挪用、命名重置与凝视结构等策略,将中国本土动物符号纳入天主教训诫话语体系。异域动物在早期全球知识交流中并非自然史的边缘对象,动物书写研究为考察早期现代知识结构 with 东方想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中华图说》;动物书写;全球史;跨文化融合;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1-0095-12

0 引言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是17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学者之一,也是西方早期汉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科学、神学与语言研究之间搭建起一套整体性的知识系统,被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其代表作《中华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①汇聚地理、语言、宗教、建筑、服饰与自然史诸多领域的知识,构建起早期现代欧洲对中国的想象,极大推动了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塑造。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多聚焦于语言与宗教内容,有关中国动物书写的研究还显不足。基歇尔在本书中设置多个专节介绍中国动物,并借助大量图像,将之纳入自然史、文化象征与宗教训诫的多重语境,显现出一种以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23&ZD303)、浙江省社科联项目“从皮桑《妇女城》管窥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教育思想”(2024N034)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肖丽华,女,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后殖民主义以及动物叙事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肖丽华. 基歇尔《中华图说》中的中国动物书写与中国想象[J]. 外国语文, 2026(1): 95-106.

① 本论文依据版本:英文版: *China Illustrata*, by Athanasius Kircher, translated by Dr. Charles D. Van Tuyl from the 1677 original Latin edition; 拉丁文版: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mstelodami: Apud Joannem Janssonium-Waesberge & Elizeum Weyerstraet, 1667; 中译本:《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动物为核心的知识重构机制。深入考察基歇尔笔下的动物书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17世纪耶稣会全球知识体系运作逻辑的理解,也为从全球史的视角思考图像与文字符号如何协同参与“东方”的建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

1 图像与秩序:基歇尔宇宙观下的中国知识建构逻辑

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科学革命”与帝国早期扩张并进的历史节点,知识体系在自然哲学、神学与海外拓展的多重推动中持续重塑,基歇尔作为这一转型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被誉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文艺复兴人”(Findlen, 2004:42)。其知识系统深植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所构建的宇宙观,他“利用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连接中世纪思想体系与科学革命中日益增长的经验主义运动”(Parcell, 2009:51-62),将宇宙视为一个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嵌入神圣宇宙秩序中的象征符号(Vermeir, 2007:368)。这一象征性认知逻辑成为基歇尔建构其百科知识体系的核心思想基础,通过重新阐释自然、语言、图像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可供阅读的、普适性的”宇宙知识结构(Godwin, 2009:266)。在这一系统中,“自然世界被理解为由上帝编写的象征结构,因此可以像阅读神圣文本一样进行解读”(Hanegraaff, 2012:84)。非基督教文化被视为必须纳入神学秩序的异质元素,那么如何使之服从于宗教象征体系,成为基歇尔需要面对的问题。他的应对方案是构建一张“全球神意地图”,通过符号转译与神学再编码,将异教世界纳入基督教的“神圣”历史体系之中。这也是基歇尔研究中国的根本动因,所以他开篇便通过景教碑文的翻译与阐释,以图证明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为将中国纳入全球宗教意义体系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为完成这一全球性知识整合,基歇尔广泛运用耶稣会遍布世界的通信网络与知识通道,特别依赖在华传教士如卜弥格(Michal Boym)、白乃心(Johann Grueber)、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人所提供的大量图像、实物与文本资料。这些素材虽不可避免地包含误读,但他们都强调对经验观察与一手资料的重视,这也赋予《中华图说》某种早期科学探索的历史价值。然而,基歇尔的知识逻辑,使他的动物书写并未沿袭“描述性科学”的动物志的写作方式,而是发展出一套服务于神学训诫的表征策略,使自然之物成为神意的象征性显现。在基歇尔中国动物的书写策略中,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并置运用,协同操作,其中图像尤为关键。

从理论上来看,图像的生成与解读绝非中立。图像可以成为激发神圣宗教情感的手段(O'Malley, 2004:228),它可能描绘“一个思想、一个人、一个声音图像”,即它是“言说事物的方式”(Mitchell, 1986:29)。基歇尔的图像符号就是这种具有能动性的视觉符号,他将中国动物图谱建构为一种类似“文本化奇物柜”的形式,通过构图设计、动物姿态、寓言结构

等形成其独特的视觉逻辑,构成一种“视觉性训诫仪式”。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收藏、制作与传播图像具有“社交性和公共性”(Findlen,1994:117),而精美的动物绘图为上层社会喜爱,并成为通往神圣秩序的视觉引导。基歇尔的中国动物图像制图精良,充分运用动物的姿态、目光及其在画面中的空间安排,共同构成一种可被解读的“视觉语法”,以实现这种视觉引导。正如米切尔(W. J. T. Mitchell)所言,图像并非静止的再现物,而是“充满欲望”的“生命体”(Mitchell,2005:11),所以图像不仅承载意义,更具有激发观看者情感与认知反应的能动性,图像“仿佛有生命有心智一样对观者施加影响”,图像观看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引导观者进入训诫逻辑、内化宗教秩序的机制。基歇尔的动物图像具有这种“生命性”,他摒弃了博物志图像中静态、分类性的呈现方式,采用充满动态张力与寓言结构的构图策略,将动物置于情节性与训诫性场景中,从而建构出一个视觉教化场域。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便是中国凤凰图像:动物身体被赋予基督教德性隐喻结构——肩象征美德,翼象征正义,腰象征顺从,躯干象征忠诚——构成一幅身体化的“道德图谱”,将中国祥瑞之禽转化为基督宗教伦理的视觉表征。而拉丁文版第194页中的猿猴图像更为典型,图像呈现多重凝视,指向复杂的权力分布,图像在这里成为一则视觉寓言。而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图像本来就不是装饰性附属物,当面对“文字不通”的信众,图像可以充分调动观者的情感,塑造宗教伦理,成为极为有效的训诫媒介,可以承担教化功能(O'Malley,2004:193)。这种结构性的图像修辞策略在《中华图说》中极为关键。

在17世纪全球跨文化知识迁移的早期阶段,图像在视觉秩序的建构中承担着文化翻译与再编码的重要职能。对于耶稣会而言,知识的生产意味着一套制度性、象征性与视觉性的整体重组工程,本质上是在“从自身文明的视角出发对世界的构建”(康拉德,2018:17)。由此,《中华图说》作为耶稣会全球传教体系的重要产物,其图像功能必须置于早期现代全球知识交流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图像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参与的意义生成机制。在这一框架下,知识的迁移并非线性、单向的扩散,而是伴随着翻译、协商与再编码等复杂过程。正如康拉德所指出的,“世界性”知识往往在特定的话语与制度结构中被预设性地建构,从而可能遮蔽真实的文化互动(康拉德,2018:4-5)。因此,研究者需要突破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关注知识的“流动”与“交换”,以揭示其在文化交汇处如何被重组,并生成新的意义结构。在关注知识如何在跨文化情境中被重组与再编码的同时,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提出的“互联历史”概念亦为理解早期现代欧亚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补充。苏布拉曼亚姆在研究16-17世纪欧亚关系时指出,跨文化接触往往生成误读、转译与多源性知识的共生结构;而他者文化与历史材料的筛选、修辞与传播,则深受其所处政治与文化语境的规约。在这一视角之下,欧洲在这一时期对东方的想象可以被视为“东方主义的前史”,其中文本与视觉材料同等重要,因为

许多文本“包含了精心绘制的插图”(Subrahmanyam, 2005:16)。这一强调文本—视觉共同建构意义的分析路径,与我们对《中华图说》图像功能的关注形成呼应。苏布拉曼亚姆的史学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基歇尔及其他耶稣会士的东方书写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点,使其不再被视作单向的知识输出,而是置于复杂的跨文化互动网络中加以理解。《中华图说》中的中国动物书写就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重组”:尽管这些动物形象的原始素材与知识资源扎根于中国本土语境,但在耶稣会士的神学编辑与训诫策略之下,它们被重新编码并纳入西方宗教伦理结构之中,转化为具有训诫功能的“混杂性”知识形态。只有在充分借重上述理论立场的前提下,才能更有力揭示《中华图说》的图像机制在耶稣会全球传教体系中,通过对异质文化元素的策略性重构而发挥的独特功能。不能将此简单理解为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单向输出,而应将之视为早期现代全球语境中知识互动过程的跨文化转换实践。

通过梳理基歇尔的知识观、图像在基督教训诫文化中的功能,了解17世纪的欧亚知识互动的背景,可以看出对《中华图说》的解读,必须将之置于全球知识迁移的历史进程中。符号并非中性的资讯载体,而是建构世界观与文化认同的关键机制,它们关涉的是“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欧洲和非欧洲地区之间的互动”(康拉德,2018:55),基歇尔借由图文并置的策略,书写中国动物,营造出一个被神学符号化、可被纳入欧洲知识体系的“中国”图景。此种图像建构不仅服务于其神学构架,同时也深度参与了早期现代世界知识形态的生成。因此,有必要围绕具体动物书写个案,更深入考察基歇尔在《中华图说》中的操作策略,以揭示他如何以图像与文字符号的协作,构筑起一套跨文化的视觉知识体系。

2 误读、翻译与再造:中国凤凰的跨文化转译与视觉编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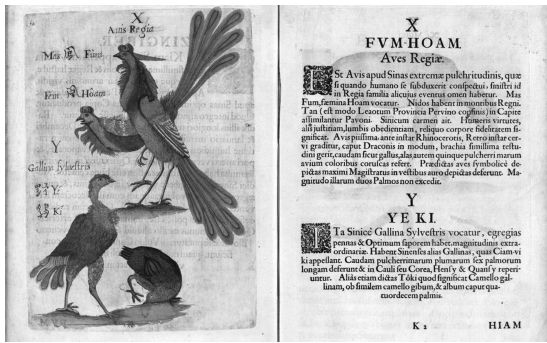
如上文所述,基歇尔的写作正处在17世纪科学探索兴起与神学权威仍具支配力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基督教神学依旧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宇宙秩序的基本理解框架;另一方面,关于自然的知识则通过博物志、旅行报告和图像汇编等渠道不断被采集与扩展。二者虽路径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服务于同一个宏大的知识目标:对世界进行系统编目。“随着大量来自新大陆与其他地区的新奇物件涌入欧洲”,欧洲人试图通过编撰“总括所有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来应对这一“知识危机”(Burke, 2000:109)。这种“编目”本质上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重写”,西方通过对他者知识的选择性重组与语义编码,试图将其整合进自身的话语体系之中。基歇尔的工作正体现了这一历史趋势,“他的认知交织着新旧两种知识范型”(潇潇,2021:26),在这一过程中“误读”与“再造”不可避免。有学者指出基歇尔的本意即不追求准确,他有意通过“误读”从而将他者文化进行转化,为基督教文化所用(周佳,2022:142)。在《中华图说》中,诸多具有高度文化象征意义的动物个案体现了这一

文化整合与挪用的过程。例如中国“龙”,基歇尔通过不同章节分别探讨其文化内涵,虽未直接将其等同于西方传统中的“恶龙”,却通过分类学框架将其归入“serpentum genus”(蛇类之属),借此进行神学收编。同时,在介绍“龙脉”概念时,他明确将中国风水斥为“荒谬迷信”,将中国文化核心图腾纳入“误信”范畴,从而实现对其象征地位的去神圣化处理。这一操作路径,在“凤凰”的书写中进一步被复杂化,呈现出更具分析价值的跨文化转译与操作策略。

人类对动物的理解与界定,始终嵌入了“特定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范式”(胡司德,2015:27),反映了人类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中国凤凰(Fum-Hoam)在17世纪被纳入耶稣会的全球知识编纂体系时,就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两种文化范式的差异与冲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凤凰不仅频繁出现于《山海经》《礼记》《尔雅》等古籍,也广泛应用于宫廷礼制、服饰制度与皇家图像,承载着祥瑞的传统意义,更在历史演化中被赋予政治合法性与伦理象征功能。这一象征系统可追溯至两汉时期以“王道”伦理为核心,借助“五德终始说”加以论证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并在清代学者郝懿行对《山海经》的笺注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呈现:“赤鸟名凤,其状五采,冠有文章。文曰:首曰德,翼曰义,背曰礼,肩曰仁,腹曰信。是五德之象也”(郝懿行,2019:18),显示了凤凰在儒家文化中所承担的国家伦理符号功能。基歇尔专辟一章介绍中国凤凰,按照他在《中华图说》中对其资料来源的说明,笔者进行文本核对,有关凤凰的书写,无论图文皆来自卜弥格的《中华植物志》(Flora Sinensis, 1656)^①。卜弥格显然受到了儒家文化关于凤凰德性象征体系的影响,他赋予凤凰以雌雄之别,命名为Fum(雄)与Hoam(雌),并吸收了五德之说,但他将之转译为更符合基督教教义的道德范畴:肩象征美德,翼象征正义,腰象征顺从,其余身体象征忠诚。这一转译其实是一种阐释,在转译过程中,卜弥格对儒家德性结构进行了删改与重构:“翼曰义”被相对忠实地转译为“iustitiam”;“信”被重新编码为“fidelitas”,突出信仰层面的忠贞与承诺。但他省略了原本“五德”中的“礼”与“仁”,取而代之的是“obedientiam”(顺从)与“fidelitatem”(忠诚),从而使凤凰的象征结构更贴合基督教伦理语境。尤其是他将儒家文化的“礼”简化为“obedientiam”(顺从),不仅削弱了“礼”在儒家文化中关于人伦秩序与和谐理想的多重意义,也体现出天主教以“顺服于神”的价值结构对儒家概念进行的重写。由此看来,卜弥格对凤凰德性寓意的转译,与其说是一种误读,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化调适,体现了知识在全球迁移过程中常见的重构方式。

基歇尔以卜弥格的论述为基础,对中国凤凰进行了更综合的改造。从文本层面看,他如实转录了卜弥格关于凤凰的德性描述,基本保留其结构逻辑。然而,在图像设计上,与卜弥格插图(下图)中对凤凰雌雄与自然分类的强调明显不同,他所构建的是一个具有明显

^① 本文使用版本为 Michał Boym(题名页署名:Michael Boym), *Flora Sinensis*, Vienna Austriae: Typis Matthai Ristij, 1656.



教义性的图像符号(左图)。他将凤凰形象置于画面中心,挺立昂首、羽翼舒展,栖于象征圣洁的香木之上,背景辅以理想化山水、飞鸟、远塔等元素,这一空间不仅引导观者聚焦于凤凰“德性身体”的象征意涵,也制造出一个类似布道的“训诫式剧场”。如本文理论部分所述,基歇尔将动物图像纳入神圣秩序的符号系统,使其成为某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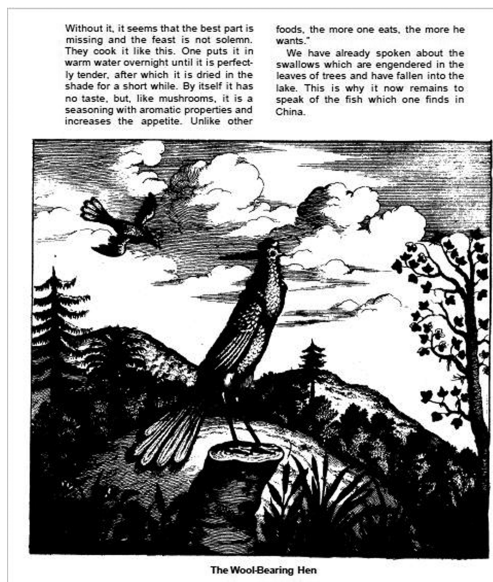
带来宗教体验的“视觉元素”(O'Malley, 2004:190),凤凰的身体由此转化为“道德结构的可视化”。表面看他明确将凤凰命名为“Regiae Aves”(王者之鸟),侧重了其与政治伦理、德政秩序之间的象征关联,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结构的理解。然而,基歇尔的落脚点却是将凤凰归入“异域孔雀之属”。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食谱中,孔雀常作为贵族盛宴的食材出现,彰显权力与品位,因此对欧洲读者而言,孔雀与世俗奢侈享受联系在一起。那么将中国凤凰降格为孔雀属类,便构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象征性祛魅,关于王者之鸟的象征表述也自然转为反讽,从而导致对“神鸟”政治—伦理内涵的解构。基歇尔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转译”,原因或许并不主要在于对他者文化的误解,而在于他有意识地对材料进行重新编码与意义重构。他的处理策略强调“概念的完整性”与“出版的适配性”,其图像呈现更偏向编纂性的整理,而非对实景的写实再现(陈研, 2023:48)。因此,唯有通过解构“龙凤”的神圣地位,才能将这类形象纳入以训诫为目的的欧洲象征体系,使之成为可被基督教教义吸收与利用的视觉资源。由此可见,凤凰自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德性象征出发,经由卜弥格的文化翻译进入拉丁语训诫系统,最终在基歇尔《中华图说》中被进一步世俗化改造,其意义轨迹清晰描绘了一条从儒家政治伦理向耶稣会视觉教义过渡的知识迁移路径。



更加需要强调的是,基歇尔在处理这一图像时采取了更为隐蔽而复杂的策略。他在图像上几乎完整挪用了卜弥格原作中的凤凰图,但在命名上却将其称为“Gallina Lanigera”(产毛母鸡)——这一命名方式显然属于西方博物学传统中典型的“自然奇观”分类格式。名称与图像之间的显著错位或许并非基歇尔的“误判”,而是一种出于功能性考量的重组策略。基歇尔在正文中写道此种“毛羽如羊毛之中国母鸡,其毛可采”,这一描述直接来源于卜弥格对丝羽鸡(Ciam-vi ki)的记述:其羽“如绵”“背似骆驼”,但卜弥格并未为之绘制相关图像。面对图像的缺席,基歇尔通过挪用原本的凤凰图像来填补“产毛鸡”这一知识

空白,并借助拉丁命名的方式将其纳入“自然奇观”。换言之,基歇尔在此制造了有意的图文错位,而这一操作揭示了17世纪欧洲编纂东方知识的一种典型方式:所谓“翻译”并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还包括对图像的借用、意义的重新编码与命名权的再分配,从而为文化他者建构出一种可被欧洲知识体系吸收与理解的身份。

这一图像与命名的错位在《中华图说》英译本中又被直接继承,未加任何批注地沿用了“Gallina Lanigera”之名,在图下注中标为“The Wool-Bearing Hen”,以奇观化的语调介绍该鸟“貌似禽类却能生毛”(见右图)。此种错误沿用显著削弱了凤凰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涵,使其退化成为一种猎奇性质的“东方奇禽”。随着这一误译的不断复制与流通,凤凰图像原本承载的伦理教化功能与文化语境逐渐被剥离,转而成为一种脱离语境的、可供观赏的“物种再现”。此类误用,在视觉文化传播中却往往获得某种权威性与可信度,形成了福柯所说的“真理效应”,真理之所以“显得真实”,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真实,而是因为它在特定的规则系统中被接受、被区分、被赋予权力效应(Foucault, 1980:132)。中文版译者显然注意到了基歇尔拉丁原版中图像与文本之间的错位,因此在译本中进行了图像与语言的重新匹配。在中译本第196页,凤凰的图像被嵌入相应的文字段落中,但未再附加名称;而第197页原本无图名的禽类插图,则被明确标注为“有毛的鸡”,对应的正是基歇尔关于Gallina Lanigera(产毛鸡)的奇观式描述。中文译本的这一“修正性翻译”策略,通过图文重配,修补了图像与语言的错位,具有积极意义:至少使中文读者得以在视觉上辨识他们已熟悉的凤凰意象。然而,由于译者并未解释基歇尔原作中图像错位的生成机制,此举仍带来某种遮蔽效应。它掩盖了基歇尔将象征性图像“物种化”的知识操作,尤其是弱化了欧洲在构建东方知识时所采取的策略性处理方式。要真正理解欧洲知识体系如何在跨文化情境中“建构”出所谓的“中国”,就必须完整揭示这类再编码与再配置的机制。这正是本文解析基歇尔中国动物书写过程与策略的核心目的所在。



综上所述,从卜弥格的物种分类与训诫意义,到基歇尔图像命名的偏移,再到英译本的强化与进一步奇观化,以及中文版的选择性修正,凤凰在这条翻译链上的变迁,呈现出象征意涵的滑动与文化阐释权的变化。凤凰图像的跨文化旅程,是17世纪全球知识迁移与象征再造的一个典范个案。但是,在这一知识迁移的复杂进程中,动物图像还具有更为多样化的复杂的表征功能,这体现在基歇尔对中国猿猴的书写中。与凤凰书写的路径不同,猿

猴在视觉结构中扮演“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双重角色,承载更深层的文化寓意与权力关系。

3 凝视的寓言:猿猴图像中的训诫机制与全球视觉秩序

《中华图说》中的动物书写,服务于耶稣会旨在传播信仰的“视觉教义”工程,同时回应了17世纪欧洲观众对东方奇观的期待,是欧洲想象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典型的东方地域,长期被西方置于他者地位,逐渐成为一个可以描述和认知的话语性存在”(朱建平等,2015:116)。基歇尔的中国动物深深嵌入耶稣会横跨欧亚的通信网络与跨文化知识编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异教、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界限不仅构成了知识迁移的前提条件,也深刻塑造了其内在的话语结构,最终深刻影响了欧洲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猿猴是其中一个重要个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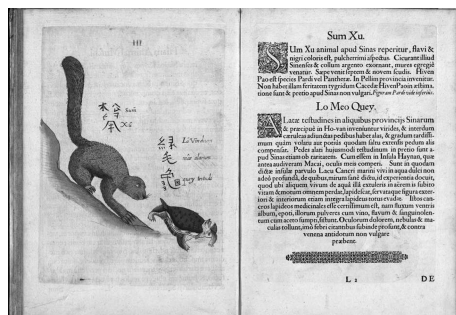
与龙、凤不同,猿猴虽在中国文化中亦具动物象征意义,却未被纳入儒家官方的德性叙事体系或皇家祥瑞的象征结构之中。猿猴对欧洲人也并不陌生,具有稳定的寓意内涵。在古典与中世纪传统中,猿猴便一直作为“类人而不及人”的典型形象出现,尤其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与各类动物绘图中,它们更普遍被赋予“模仿而堕落”的文化内涵:虽能复制人类行为,却无法触及理性与德性,从而构成了人类伦理秩序的负面镜像。例如,猿猴“被描绘为人类的劣质复制品——模仿者,缺乏理性、道德或神圣之魂”(Grant,2024:2)。在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与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等人的博物志中,猿猴的形体特征与行为表现依然被强调为“人兽边界的模糊地带”。因此这种“类人而非人”的模糊边界,使猿猴成为宗教话语中理想的训诫对象——既近似于人类,又因缺乏神性而成为堕落的警示。基歇尔在《中华图说》中对中国猿猴的呈现,延续并重组了这一传统。

从命名层面来看,基歇尔并未对中国猿猴进行严格的分类界定,而是采用了多种杂糅的术语,如 Simia(猿猴)、Simiarum(猴类)、Homines sylvestres(森林之人)、Sylvestris homines(野生人类)以及 Fefe 等。这种命名策略体现了16至17世纪图谱传统中对猴类“命名混杂”的特征。而在这些命名之下,基歇尔频繁使用带有道德评判色彩的修辞词汇,如 Simiarum ferocitate immanium(极度凶猛的猴类)、pilosissimum corpus(体毛极其浓密的身体)等,这些词汇不仅描绘动物性特征,更是预设了“非人性”的视觉认知框架,使猿猴的“毛发”“野性”与“模仿性”成为对人类“德性”与“理性”的负面对照。猿猴作为“类人而非人”的边缘生物,自然承载起关于“homo lapsus”(堕落之人)的隐喻功能。基歇尔的中国猿猴书写重申了这一训诫价值,但他更进一步的是,将之放入了全球地理维度的文化考量之中。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全球探索与海外贸易的推进,来自非洲与亚洲的猿猴大量涌入欧洲社会,它们一方面作为自然博物馆中的陈列标本与上流社会的奇宠进入现实生活,另一方面频繁出现在印刷出版物中,成为重构“他者文化”的重要视觉符号。猿猴便由“寓言性动物”逐渐转化为“异域动物”,被整合进欧洲关于“新世界”与“东方”的图像观看体系之中,并演化为地理想象与文化等级观念的隐喻。正是在这一文化张力场中,基歇尔对中国猿猴的书写显示出更加复杂的意涵:一方面,它延续了欧洲寓言传统内部关于“人—兽边界”的文化想象,作为“准人”形象承载反思人类理性、道德与教化的象征功能;另一方面,在全球知识迁移的语境下,猿猴被赋予了“观察者”的双重位置,成为基督宗教与异教、欧洲与东方之间视觉权力关系编码的关键。即猿猴既是训诫的对象,又承担一个凝视者的位置,从而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具备了某种权力的可能,它作为一种“观察与被观察”的双重媒介,体现了欧洲与东方的文化互动的复杂性。

《中华图说》中有多幅猿猴插图,我们以第 194 页的图像为例(如右图),分析这一复杂结构。这幅插图对应的文字部分是描述一种名为“Sumxu”的珍稀动物,图文资料皆直接取材自卜弥格的《中华植物志》。在卜弥格的拉丁文原稿中,Sumxu 被描绘为一种“毛色由黄色与黑色交织而成、毛发柔美的中国猫类动物”,性情驯良、擅长捕鼠,价值高昂,常被中国人圈养,并在颈部佩戴银质项圈。描写语气客观,侧重经验观察与地方知识的记录。基歇尔在《中华图说》中对 Sumxu 的处理却并非单纯的知识再现,训诫性意涵显著增强。该动物的基本特征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策略主要体现在图像与语言的编排,呈现出明显的驯化、控制与象征性特点。Sumxu 作为一种异域珍兽,其“罕见”与“驯顺”不仅构成其自然特性,更被编码为文化他者的表征。英文译本在延续基歇尔框架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其“被驯化性”“华丽外貌”与“市场价值”的特征标签。但是,最值得辨析的是基歇尔对该动物图像的再创作。

卜弥格所绘的 Sumxu 插图(如右图),简洁明晰、非叙事化,表现的是观察性色彩,强调经验描述与地方知识的记录。基歇尔对该图像的再创作则显著偏离了这一中性的知识模式。他绘制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中国建筑场景:两位身着汉服的中国人牵引着一只脖戴项圈的 Sumxu,画面左下角特意添加了一只注视全景的猿猴。这一视觉构成就将图像从静态的物种展示转化为充满寓意的“训诫剧场”。在这一构



图中,Sumxu 作为被驯化与被观看的动物他者,处于权力结构的最末端;牵引其行进的中国人居训诫关系的主导地位;而猿猴作为“画中观察者”,承担起凝视与见证的视觉功能。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呈现给真正的观察者——欧洲的读者,从而形成了一套多重观看与权力分层的视觉链条。其中,中国人对动物的驯化,是被根植于基督教的神学伦理体系之中的,根据《创世纪》,神赐人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走兽,这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治理自然”的神学合法性基础,也为人对动物的驯化赋予道德正当性。在这一语境下,中国人对 Sumxu 的驯养行为被置入相同的训诫结构,成为“人性优越”这一神学观念的文化延伸,隐含地传达了耶稣会的传教立场:尽管东方人尚处于信仰的“迷误”之中,但其行为已表现出可与基督教教义兼容的伦理潜力,可共同享有“管理万物”的地位。基歇尔对中国人的这一设定,正是为他的现实目标服务,即向罗马教廷呈现远东传教的可行性与正当性,藉此为耶稣会在全球传教争取来自教廷更有力的支持。

但是,“中国人”对万物管理权的共享,被来自角落的猿猴的凝视打破了单一的线性阐释结构,指向一种更为复杂的观看逻辑与文化政治关系。“他者化”是一种话语过程,他者的建构和话语实践密不可分(王惠敏等,2025:75),此时的观看不是西方主体对动物他者的单向凝视,不是理性对本能的训诫寓言,而是在动物目光“倒置”的机制中,生成了一种跨越人—兽、主体—客体、欧洲—中国的复合性观看结构。由于猿猴本身的“类人不如人”的文化寓意,它目光中的 Sumxu 的被牵引与服从,以及猿猴本身的“次等”身份,对于读图的欧洲观众而言,就皆成为东方人的象征性延伸。猿猴的存在提示着一种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存在的等级,驯化从而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的同构逻辑,东方他者被纳入基督宗教训诫话语体系的象征秩序之中。从而,东方异教徒与动物并置为可被规训、归化与控制的对象。这一观看机制的背后,是以地理、文化与宗教边界为框架所构建的秩序,在这里,空间认知、文化象征与神学解释,缝合为一个完整的视觉系统,体现了历史学中的“不对等概念”——“希腊人”“基督徒”的优越感、贬义的“蛮族”“异教徒”的不对等,形成的是一种对异质文化行为的简化性归纳与文明化刻板描绘,其根本目的是为文化与政治的主导权提供合法性(陈恒,2024:41)。由此可见,动物图像并非中立媒介,而是参与了这一视觉主权的象征性生产,成为后殖民理论批判的核心对象之一。

总之,基歇尔在 Sumxu 与猿猴的图像中,通过重新配置“谁被观看”“谁在观看”以及“谁的目光被赋权”等关键位置,使观看本身成为权力运作的方式。通过分析 Sumxu、东方人与猿猴在观看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可以有效解读基歇尔对中国动物书写的策略。基歇尔笔下的动物图像因此不仅是自然知识的传播媒介,这些动物图像还通过“构图的安排、颜色的结构或色调体系”等表达了“具有雄辩性”的思想(Mitchell,1986:41)。他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的确为18世纪的“中国热”奠定了基础(张西平,2008:195),但是我们也不要

忽视,其中也隐含了桑杰·苏布拉曼亚姆所言的“东方主义前史”的本质特征。

4 结语

《中华图说》中的中国动物书写,并非单纯的自然史记录,应被视为早期现代全球知识迁移中一项高度自觉的视觉—话语实践。本文通过对凤凰与猿猴等个案的深入解读,重点揭示了基歇尔如何通过图像挪用、命名重置与凝视结构的设计,将中国本土动物符号纳入耶稣会的神学训诫体系,并由此参与构造一种可被欧洲知识秩序理解的“中国”,深刻影响了此后欧洲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由基歇尔的中国动物书写可见,动物在跨文化知识生产中并非边缘存在,而是承载复杂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象征媒介,其学术意义迄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本文尝试把“动物书写”从传统的自然史附庸位置中解放出来,将其视为观察早期全球化知识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切口。重返基歇尔这类早期现代文本,有助于揭示欧洲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通过“误读”“翻译”“重构”的操作链条,建构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图景,进而反思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那些被遮蔽了的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 Burke, Peter. 2000.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indlen, Paula. 1994.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ndlen Paula. 2004. *Athanasius Kircher; 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M].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odwin, Joscelyn. 2009. *Athanasius Kircher's Theatre of the World;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Last Man to Search for Universal Knowledge* [M]. Rochester, VT: Inner Traditions.
- Grant, Teresa. 2024. *Apes and Monkey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1603-1659* [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Hanegraaff, Wouter J. 2012. *Esotericism and the Academy: Rejected Knowledge in Western Cul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Mitchell, W. J. T. 1986.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tchell, W. J. T. 2005. *What Do Pictures Want? The Lives and Loves of Imag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Malley, John W. 2004. *Four Cultures of the West* [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cell, William C. 2009. Signs and Symbols in Kircher's *Mundus Subterraneus* [J].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3): 51-62.
- Subrahmanyam, Sanjay. 2005. *Mughals and Franks: 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History* [M].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rmeir, Koen. 2007. Athanasius Kircher's Magical Instruments: An Essay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Applied Metaphysics (1602-1680) [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8): 363-400.

- 陈恒. 2024. 谁在叙述谁的全球史: 不对等与历史书写的陷阱[J]. 社会科学文摘(3): 39-41.
- 陈研. 2023. 实景与编纂: 17世纪中期荷兰出版者创造的中国图像[J]. 文艺研究(8): 136-151.
- 郝懿行. 2019. 山海经笺疏[M]. 缪保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胡司德. 2015.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M]. 蓝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康拉德. 2018. 全球史是什么[M]. 杜宪兵,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王惠敏, 张晓泉. 2025. 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的批判话语分析——兼论中国知识体系的非殖民化[J]. 外国语文(1): 73-84.
- 潇潇. 2021. 从《中国图说》看早期汉学的误释型知识传统及其意义[J]. 国际汉学(1): 20-27.
- 张西平. 2008. 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J]. 中国文化研究(4): 189-201.
- 周佳. 2022.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毗湿奴十化身: 文本与图像分析[J]. 世界宗教文化(4): 135-142.
- 朱健平, 邹倩. 2015. 创作与翻译的共谋——《扶桑》中国形象“双重东方化”研究[J]. 外国语文(5): 116-121.

Chinese Anim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in Athanasius Kircher's *China Illustrata*

XIAO Lihua

Abstract: Athanasius Kircher is a foundational figure of early Western sinology, and *China Illustrata*, a key product of his global knowledge project, contains extensive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animals that deeply participat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imaginings and constructions of “China”, yet this dimension remains under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Kircher's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hoenix and apes as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ies to examine how he employs strategies of image appropriation, renam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gaze in order to incorporate Chinese animal symbols into a Jesuit moral-didactic discourse. It argues that exotic anima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were far from marginal object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that the study of animal representation offers a productive theoretical lens for rethinking modern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Western imagination of the Orient.

Key words: *China Illustrata*; animal representation; global history; transcultural exchange;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责任编辑: 冯革